

# 大分流与货币金融制度变迁研究新动态

## ——“大分流与货币金融制度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

周莹

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曾指出“工业革命不得等待金融革命”,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则认为金融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皮特·罗素(Peter L. Rousseau)提出了“金融引导”(Financial Led)的概念,将经济的长期增长归因于金融体系的大跃进。显然,对货币金融制度分流的研究是更好地认识中西方经济大分流的前提条件。为了深入推进“大分流”与货币金融变迁领域的研究,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于2017年11月24—26日联合举办了“大分流与货币金融制度变迁学术研讨会暨中财大第三次经济史论坛”。来自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3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80多名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在开幕式上,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研究员充分肯定了大分流与货币金融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性,并对会议寄予了很高期望;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王茹芹教授指出近十年来围绕“大分流”的学术辩论引起了国际学界强烈的反响,这场争论将对中国经济史和商贸史的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研究员认为“大分流”不仅代表了一种学术观点,更重要的是在于以全球视野出发对经济制度和发展进行了比较,同时号召学者除了分析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之外,还应考虑和全球经济的联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涛教授从经济观念的角度肯定了大分流与货币金融变迁研究的学术价值,期待与会专家能够把这一主题深入研究下去,为当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合流”提供学理支撑。

在随后的大会主题发言中,来自北京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复旦大学的吴景平教授、清华大学的陈争平教授、云南社科院的王文成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的姚遂教授、北京大学的萧国亮教授、复旦大学的朱荫贵教授、南开大学的王玉茹教授、上海社科院的张忠民研究员分别以“从‘大分流’到‘大合流’:全球史视野中的江南经济近代转型”“龙种与跳蚤:关于法币与金圆券的比较分析”“比较利率史刍议”“中国历史上的货币白银化问题初探”“北宋商业革命为何势衰”“陈振汉先生与北大的经济史研究传统:基于‘大分流’与金融的视域”“大分流后的与时俱进:传统钱庄业在近代的演变与特点”“共性与差异——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构建的金融史思考”“新中国初期企业制度变迁”等为题作了精彩发言。之后,论坛按照“货币制度的分流”“金融制度变迁的分与合”和“全球视野下的经济转型”三个主题进行分组讨论。

### 一、货币制度的分流

元朝及以前,中国的货币制度较为先进,管汉晖(北京大学)对元朝纸币运行机制的实证研究发现:严格的银本位发行制度保证了纸币的价值稳定,但后来由于多地叛乱使得财政赤字严重,从而导致纸币超发,最终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红花(内蒙古财经大学)从货币与贸易关系的视角,梳理了元朝时期丝绸之路贸易对货币流通影响的相关文献,指出纸币是民间贸易的主要货币,并沿着丝绸之路流通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甚至被有些国家仿造。

然而,明朝建立起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之后,中国的货币制度便逐渐走向了货币“主权下移”的道路。邱永志(江西财经大学)就以货币主权为切入点,探讨了16至19世纪中日两国在货币制度构建和发展道路上的差异及其影响。他认为货币主权是中西分流的基础性因素:日本到19世纪由于制度性的遗产继承加之货币主权意识的不断增强,较顺利地走向货币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则因为“主权下移”,货币现代化举步维艰。

近代混乱的货币体系不仅引发了货币制度的种种问题,而且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刘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通过计量分析,认为在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近代中国银行总资本额、国民收入、价格水平、基础货币是影响货币乘数的主要因素,同时货币乘数、汇率、白银存量以及投资惯性会影响近代化投资;蒋清宏(中国社科院)通过对1890—1930年国际收支对银价、汇率和货币供给影响的分析,指出中国不是国际银价、汇率、货币供给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参与者,某些历史时期甚至对国际银价、汇率和货币供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李玉、杨尚华等(南京大学)指出晚清时期由于货币制度紊乱,旧币制下的银两、制钱、银钱票等和新兴的银元、铜元、银行兑换券、外国货币并存,使得假币泛滥,不仅对近代货币制度发展产生极大负面影响,还扰乱了市场秩序、威胁经济的稳定发展。徐德莉(重庆工商大学)对假币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不健全和缺乏规范的金融货币体系在融入国际货币体系时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在抗战时期,日军通过伪造大量法币和边币破坏中国货币市场,严重干扰了中国货币体系和战时经济秩序,导致社会危机。刘成虎(山西大学)通过探讨晋商从营口开港到20世纪前10年支持和参与东北商业发展的过程,发现晋商在东北势力衰弱除了由于内忧外患的经济社会环境外,更因为不健全的币制和企业经营制度。

## 二、金融制度变迁的分与合

围绕金融制度分与合的主题,与会学者深入分析了在西方冲击下中国传统金融衰败的原因。燕红忠(上海财经大学)指出经济现代化必然伴随着金融的加速发展,而各国的政府行为、金融条件及其发展路径将直接影响着它们的经济进程,这也是中西方金融“分流”的基本动因。马陵合(安徽师范大学)指出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否不仅取决于可供资本规模,更取决于资本成本。这不仅影响国内的资本形成能力,还影响获得外资的能力。近代中国,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吸收外债不充分且缺乏效率,限制了外债对中国经济制度近代化的影响和作用。周莹(中央财经大学)通过分析政商在公债整理中的博弈,认为国民政府难以树立稳固的政府债信,由于缺乏公信力导致利率居高不下,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陈宏亮(贵州财经大学)认为法律的制约、官股作用的大小和地方经济条件的差异是影响民国时期县银行官商股权结构的主要因素。

尽管中国金融制度的近代化之路艰巨而坎坷,但在中国近代也逐步迈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国际合流之道。刘志英(西南大学)对重庆商业银行进行了考察,发现在四行二局等国家银行与大量沿江沿海商业银行内迁的带动下,重庆本地商业银行也有了新的发展与变革,在组织构建、业务活动、企业管理、制度建设、金融机构网络化等方面发生了现代化的发展与变革。曲迪(中央财经大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随着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其与经济发展、生产和投资的联系具有趋同效应。尽管银行业流动性不足,但随着每次金融风潮的冲击,银行业经营变得更加稳健。张徐乐(复旦大学)指出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实现对外商银行的有效监管经历了漫长且艰巨的过程,直到1947年《银行法》的颁布与实施,对外商银行的监管才取得了实质的进展。张宏彦(山西财经大学)通过对清代晋商万里茶路中金融问题的研究发现,清代晋商的跨国茶叶贸易依赖于金融支持,同时长途贸易也对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贺水金(上海社科院)利用档案史料对标金与近代上海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周祖文(中国社科院)研究了战后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之间的关系。龚关(南开大学)指出战后台湾经济的工业化、自由化,在技术、资金、经营方式等方面给农业

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台湾的农业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工业化、自由化提供的机遇,但在制度的因应上表现迟缓。此外,易绵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总结了近十年来关于中国近代银行史的研究,指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资料挖掘上,都有所创新,关于重要银行的专史、红色银行史、民营银行成长、银行微观管理、银行思想与银行业发展的互动、日伪银行等研究领域还有待拓展。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金融发展还处在不断摸索的阶段,在全球化的演进中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赵学军(中国社科院)通过考察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性质、发展历程等,认为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是不成功的探索实践,但在农村金融体系发展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创立是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一个创新,同时其在管理方面的缺陷也值得我们深思和重视。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从金融功能的视角对新中国金融的发展变迁及其特征进行了系统深入地梳理和总结,指出在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金融体系的构建之后,中国金融很快就进入了“管资金”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在“管资金”与“调市场”之间的游移,逐步确立了“调市场”的定位。陈俭(信阳师范学院)指出城乡金融关系的核心在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补贴制度,吸引农村资金回流,建立城市金融支持农村金融通道,增加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实现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互助,最终实现城乡金融一体化发展。宋士云(聊城大学)认为中国自成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以来,积极致力于完善国际监管标准,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将国际标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国际标准的中国化,同时积极推动银行业改革与发展,增强了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和国际竞争力。

### 三、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中西分流不但改变了货币金融制度中的中西方演进道路,而且给中西方经济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陈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估算出中国近代政府购买的时间序列数据和1903—1926年的投资额。林枫(厦门大学)解读了宋光宇《城隍爷出巡》一书,经由霞海城隍祭典展示大稻埕乃至台湾的百年文化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和不断转型的阶段。孙建国(河南大学)梳理了1962年以来河南省工商界生活互助金委员会的开展过程以及对政府和工商业者的积极作用,他认为生活互助金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孙圣民、刘姝辰(山东大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上山下乡经历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且该影响随着女知青年龄的增大逐渐消失;同时,上山下乡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地位。肖翔(中央财经大学)经过实证研究证明,“振兴东北”战略有利于企业的产值增加,但不利于提升利润。进入“新常态”后,以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深化企业改革、进一步调整政商关系以及充分利用大、小型企业各自特点,实现优势互补。彤新春(中国社科院)指出随着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影响,2008年4万亿投资的政策倾斜,以及投融资政策的开放、多元,中国的轨道交通后来居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互联网、大数据经济的时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迹象,共享出行异军突起,民间资本试水公共交通,中国公共交通正在向多元化投资模式转型。荣晓峰(山西大学)建议科技型小微企业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众筹平台发展壮大、加快互联网众筹行业监管和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提升互联网众筹平台营运水平、构建完整的互联网众筹产业链和推动互联网众筹生态圈建设等。隋福民(中国社科院)主张重视陈翰笙当初通过调查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来认清中国社会性质的工作,这将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责任编辑:高超群)